

## 乡饮酒礼与食犬风俗

### ——《仪礼》酒会用牲制度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渊源

胡新生

**摘要:**《仪礼·乡饮酒礼》及相关各篇记有贵族酒会使用犬牲的规定,按这一规定举行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都带有食犬宴会的性质。如果不计饮酒仪节,《仪礼》描述的乡饮酒礼其实就是一场“狗肉盛宴”。对照周代用牲制度来看,《仪礼》所说专用犬牲的规定并非当时乡饮酒礼和类似酒会的通例,很可能只是鲁国及邻近地区特有的习惯。西周春秋时期的鲁国保留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该地区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惯例当是沿袭了商族常用犬牲和喜食犬肉的传统。辨明《乡饮酒礼》食犬惯例的性质和来源,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仪礼》的史料价值和周代礼俗的地区差异等问题。

**关键词:**《仪礼》;乡饮酒礼;犬牲;食犬风俗

《仪礼》的《乡饮酒礼》等篇侧重于描述东周时代贵族酒会的饮酒程序和仪法,对于酒会中牲肉、肴饌方面的情况则只有极简略的说明。后面这部分内容往往不为研究者所注意,其实它最有特点。按《仪礼·乡饮酒礼》的说法,乡饮酒礼例须使用犬牲,《仪礼》书中与该篇内容密切相关的《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三篇也都有相同的规定或暗含此种规定<sup>①</sup>。这种特殊的用牲规定不但在后世正规的礼仪活动中十分罕见,即便在东周时代的礼制背景下也显得别具一格。《仪礼》何以会有这样的记述?用犬规定能否说是周代乡饮酒礼的通例?乡、燕等贵族酒会使用犬牲的惯例原本是哪一地区或族群的风俗?这些问题与《仪礼》的撰作背景、《仪礼》所记礼典的通行程度、周代礼俗的地区差异等许多重要的问题相关联,很有必要详加探讨。以往研究先秦祭祀制度和饮食风俗的论著对当时的犬牲使用情况有所论列,一些考古学著作提供的材料尤为详细。本文将结合这些背景资料对《仪礼》用犬礼制的性质和意义作些初步的分析。本文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点:1. 从用牲角度说,《仪礼》记述的乡饮酒礼其实就是乡中贵族共食犬肉的宴会。2. 《乡饮酒礼》所记使用犬牲的规定并非周代乡饮酒礼和同类酒会通用的礼制。3. 《乡饮酒礼》此类记载的素材和依据是鲁国或齐鲁地区带有地方特色的乡饮酒礼。这种特殊的用牲惯例有其古老的文化渊源,其形成与东方民族特别是商族常用犬牲和喜食犬肉的传统有关。下面就对这些观点依次作出说明。

#### 一、《乡饮酒礼》等篇记录的食犬盛宴

《乡饮酒礼》篇末“记”文对该项礼仪使用犬牲有明确的记录:“其牲狗也,亨(烹)于堂东北。”对照这一记载重新检视《乡饮酒礼》对酒会主要程序的描述,可以看出享用犬牲的活动同饮酒仪法一样贯彻于乡饮酒礼的始终。

---

**作者简介:**胡新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① 《大射仪》没有用犬明文。据《礼记·射义》“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可知大射也同燕礼一样使用犬牲。历代礼家均持此说。

乡饮酒礼正式开始的时间一般要根据牲肉煮熟的时间来确定,这意味着使用犬牲已被当成整场酒会的起点。《乡饮酒礼》开篇所记选定主宾、通知主宾、陈设器物诸节只是礼仪开始前的准备工作,等到“羹定”之后主人召集主宾、副宾和众宾前往行礼场所,饮酒礼才算真正开始。这里的“羹定”,实际是一个表示时间的概念,它与士冠礼的“质明行事”、士昏礼的“必用昏昕”、士虞礼的“日中而虞”等说法的性质大致相同,稍有区别的只是“羹定”的概念弹性较大,所指的时间段不像“质明”、“日中”那样固定而已。“羹定”的字面意思是指肉熟,具体到乡饮、乡射诸礼来说,它的含义是指犬牲已熟可以献宾。《乡射礼》“羹定”郑玄注说:“肉谓之羹,定犹孰(熟)也,谓狗孰可食。”<sup>①</sup>这条注解比郑玄对《乡饮酒礼》“羹定”的解释更为完备,其中最后四字用于说明乡饮酒礼的“羹定”也同样恰当。酒和肴在贵族酒会中都不或缺,像乡饮酒礼这种具有一定规模的贵族酒会更不可能徒饮而无牲肴之佐。酒会中的用酒可以事先准备,杀牲、烹煮却必须临时进行以保持牲肉的新鲜,牲肉不熟酒会就无法举行。因此,乡饮酒礼虽更侧重饮酒仪节,却不能不以“羹定”即“狗孰可食”作为礼仪开始的起点。

乡饮酒礼的前半段特别讲究礼敬和规范,饮酒礼仪的等级差别在这一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一般的参与者在前半段的饮酒活动中只以脯醢(干肉和肉酱)为佐肴,而身份特别尊贵的主宾、主人和副宾在脯醢之外还可享用“折俎”。“折俎”一词有三种相互关联的含义:表示器物时是指一种专用的俎;表示处理牲体的方式时是指将牲体“枝解节折”后载于俎上;表示俎中食物时相当于今人所说的排骨、带肉骨之类。乡饮酒礼所用的脯醢,经文没有说明系何种牲肉所制;折俎上盛放的牲骨则很明确,就是《乡饮酒礼》“记”文所说的在堂东北煮熟的犬牲之骨。《乡饮酒礼》“记”提到:“俎由东壁自西阶升。”郑玄注说:“亨(烹)狗既孰(熟),载之俎,饌于东方。”<sup>②</sup>这条注解有提醒、强调之意,即再次申明折俎中盛放的是煮熟的犬牲而不是其他牺牲。《乡饮酒礼》“记”又说:“宾俎:脊、胁、肩、肺;主人俎:脊、胁、臂、肺;介俎:脊、胁、肫、胙、肺。肺皆离。皆右体进腩。”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三种“折俎”上盛放的各类带肉骨以及专供祭俎之用的“肺”,都是特指犬牲而言。

尊贵人物的享用折俎而众宾没有资格享用的现象,并非乡饮酒礼所特有,而是饮酒礼仪中的通例。清人凌廷堪曾归纳道,《仪礼》中“凡献酒皆有荐(笔者按:“荐”指脯醢),礼盛者则设俎”<sup>③</sup>。这条通例说明,俎肉俎骨在各类肴饌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又据《乡饮酒礼》描述,酒会前半段比较严格的献酒程序结束之后,“司正升自西阶,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请坐于宾。’宾辞以俎”。郑玄注说:“请坐者,将以宾燕也。俎者,肴之贵者。(宾)辞之者,不敢以礼杀当贵者。”<sup>④</sup>主人的意思是请主宾安坐,下一步将进行相对轻松适意的饮酒活动,而主宾却以折俎仍在、不敢放肆为由礼节性地作出谦让和推辞。对待折俎必须出之以庄重和严肃的态度,在它面前不能简省礼仪、过于随便,那些较为自由安闲的饮酒活动只有等撤除折俎以后才能进行。由此可见,折俎确是行礼者心目中的“肴之贵者”。对于折俎用犬牲的乡饮酒礼而言,“俎者,肴之贵者”的通例其实可以更具体地表述为“狗骨者,肴之贵者”。乡饮酒礼前半部分的重头戏是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主人献介、介酢主人等一系列使用折俎的饮酒仪式,这部分礼仪之所以气氛庄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折俎的设置。从这种意义上说,使用犬牲之俎又是乡饮酒礼前半部分能够正常进行的支点之一。

应当指出,主宾、主人和副宾在饮酒过程中并不真正食用俎骨,只是撕掉肺末表示祭俎并象征性地品尝一下肺块。折俎的设置乡饮酒礼中基本上是一种摆设。然而这并不影响折俎的重要。行礼者是把折俎上的带肉骨看得太重要太尊贵了,以至于觉得不便在庄严的气氛下当众大嚼,由此才会形成饮酒时不动俎骨的习惯。《乡饮酒礼》“记”提到,酒会进行到撤俎阶段时,“宾、介、遵者(临时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93页。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990页。

③ 凌廷堪:《礼经释例》卷三,阮元编:《清经解》卷七八六,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5册,第152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988页。

参加的贵宾)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从者;主人之俎以东”。酒会中为宾、介等人设置的折俎撤下后都要送交他们各自的随从,让这些贵宾回家品尝;主人之俎则收藏在东壁下,供主人或其家属享用。折俎所载的犬骨肉最终仍然是供食用的,它的象征性质仅限于行礼的场合。《礼记·祭统》说:“凡为俎者,以骨为主。骨有贵贱。……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和祭礼对俎的处理一样,乡饮酒礼的主持者将贵贱不同的犬骨肉分送贵宾,同样带有佳肴共享和显示身份差异的双重性质。

与乡饮酒礼前半部分的礼数繁多、仪态矜持不同的是,酒会后半部分不再刻意强调饮酒程式和对贵宾的礼敬,而是侧重营造一种亲密、友好、自由和轻松的气氛。这一阶段称为“无算爵”——郑玄注为“算,数也。宾主燕饮,爵行无数,醉而止也”,意思是不计行爵数量,也不再讲固定的行爵次序,来宾可以自由发挥,直到饮醉尽兴为止。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自由敬酒的“无算爵”阶段,乡饮酒礼所具有的集体享用犬牲的特点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乡饮酒礼》写道,撤除折俎后,包括“众宾长”在内的贵宾脱屣升堂,就席安坐,“乃羞,无算爵,无算乐”。郑玄于“乃羞”下有详注:

羞,进也。所进者,狗臠、醢也。乡(向)设骨体,所以致敬也;今进羞,所以尽爱也。敬之爱之,所以厚贤也。<sup>①</sup>

“狗臠”是指切好的大块的狗肉。宋人李如圭对郑注有进一步解释:“臠,切肉也。荐羞不逾牲,此牲狗,则羞者狗臠也。醢则杂馐牲兼作之。”<sup>②</sup>参加乡饮酒礼的众宾在前面讲究礼数的饮酒活动中只能享受脯醢之荐,那时他们不过是主宾、主人和副宾的陪衬。进入“无算爵”阶段以后,“众宾长”代表众宾共享狗臠,众宾可以自由“敬酒”,酒会的集体性公共性渐次凸显。在杯觥交错和言笑之中,在“无算乐”的伴奏之下,乡饮酒礼被推向高潮。

“无算爵”阶段的享用狗臠和饮酒活动是乡饮酒礼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场酒会的性质。

首先,“无算爵”一节在乡饮酒礼中用时最多,酒会持续时间的长短不是由其他程序而是由“无算爵”决定的。《乡饮酒礼》记录撤俎之后宾出之前的礼仪只用了“说(脱)屣,揖让如初,升,坐。乃羞,无算爵,无算乐”十六个字,其记述之简略与经文前段对饮酒仪法的详尽描写形成鲜明的对比,容易使人形成“无算爵”阶段的饮酒活动很快就草草收场的印象。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此处记述简略是因为“无算爵”阶段礼仪减省,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示的仪法,这并不意味着“无算爵”的实际过程也简短匆遽。恰恰相反,“爵行无数,醉而止也”意味着自由随意的饮酒活动耗时很长,以至于难以对它的结束作出严格、准确的时间限定。据《仪礼》的《燕礼》和《大射仪》描述,这两种礼仪进行到“无算爵”阶段时,司正(酒会上负责监督失礼、维持秩序的人员)要向来宾传达国君的命令:“无不醉!”来宾则全体起立,齐声回答:“诺,敢不醉!”乡饮酒礼规格稍低,没有司正向众宾传达命令的仪法,然而根据“无算爵”的情势可以推断,乡饮酒礼中同样少不了司正向众宾劝酒、众宾之间相互劝酒等内容,因为“爵行无数”本身就含有不计时间开怀畅饮之意。《燕礼》有“宵,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司宫执烛于西阶上,甸人执大烛于庭,阍人为大烛于门外”之说,《诗·小雅·湛露》有“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厌厌夜饮,在宗载考”之咏。对照来看,乡饮酒礼也有可能因为“无算爵”的漫无休止而一直持续到夜间<sup>③</sup>。从用时的角度说,“无算爵”比酒会前半段规范的献酒礼仪持续更久,是它构成了乡饮酒礼的主体部分。

其次,“无算爵”也最能反映乡饮酒礼的本质特征。乡饮酒礼来源于古老的氏族酒会,原本就是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989页。

② 李如圭:《仪礼集释》卷四,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册,第104页。

③ 《礼记·乡饮酒义》“饮酒之节,朝不废朝,暮不废夕”,系据常规而言,其实夜饮现象并不鲜见。

全体族人欢聚一堂共享饮食的活动<sup>①</sup>。随着文明的发展,这种酒会所附带的尊贤尚齿的功能被不断强化,同时又被逐渐加入很多显示政治等级差别即所谓“贵贵”的内容,最终就演变成成为具有强烈等级色彩的乡饮酒礼。尽管如此,乡饮酒礼毕竟承传了氏族酒会的历史传统,它在发生诸多变化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视酒食共享和追求亲睦欢洽的基本品格。《周礼·大宗伯》说:“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飧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乡饮酒礼虽是大夫或士一级的酒会,但其性质与《周礼》所说的天子举行的“饮食之礼”和“飧燕之礼”没有太大区别,同样是以强化亲爱之情作为主要目的。按照上引郑玄所说“乡(向)设骨体,所以致敬也;今进羞,所以尽爱也”,乡饮酒礼可以分成两大部分:“无算爵”以前的礼节偏重于“致敬”,狗截上堂之后的“无算爵”阶段则偏重于“尽爱”。很明显,只有强调亲爱欢洽的“无算爵”阶段的饮酒活动才最能体现乡饮酒礼的宗旨和特点。荀子认为乡饮酒礼具有“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五方面优点<sup>②</sup>,实则“贵贱明,隆杀辨”不过是等级制度的发展在氏族酒会上烙下的印记,只有“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特别是“无算爵”所表现的“安燕而不乱”,才能代表乡饮酒礼的原始意义和本质特征。没有宾、主、介之间显示贵贱差异的酬酢礼仪,乡饮酒礼仍然不害其为宗族酒会;但如果没有“安燕而不乱”的“无算爵”、“无算乐”环节,乡饮酒礼即失去其特有的风貌,变成一种贵族的私宴或家宴了。

“无算爵”一名本是特指饮酒而言,研究者往往因此忽略了与饮酒同时进行的享用牺牲的内容,实际上“无算爵”与后面这项内容密不可分。乡饮酒礼的“无算爵”同时就是全体来宾(众宾由三位“众宾长”代表)共享狗截的活动。“无算爵”决定了乡饮酒礼的总体性质,实即意味着全体行礼者共食犬肉的活动构成了此种酒会的重要内容。

《乡饮酒礼》对酒会结束后慰劳司正的描述,可以从反面映衬出此种酒会共享犬牲的特点。经文说,乡饮酒礼举行后的第二天,主人要专门举办小型的宴会以“息(慰劳)司正”。“息司正”不再请昨日的宾、介参加,主人只按个人意愿邀请少数“先生君子”作为嘉宾,所以这种宴会真正带有私宴、家宴的性质。由于不是公共宴会,其礼仪规格明显降低,所用酒肴大为减省:“不杀,荐脯醢,羞唯所有。”据郑注,“不杀”是指“市买若(或)因所有可也”,质言之即不再另杀犬牲。不杀新牲也就谈不到设置折俎。清人杨大培对“羞唯所有”的解释是:“‘羞’字承上言之,谓荐脯醢所用之羞,视见(现)在所有何物则用之。饮酒正礼用狗截,此不杀,则无狗截,故唯所有。”<sup>③</sup>乡饮酒礼的“正礼”需要杀烹犬牲以供设置折俎和品尝狗截之用,非“正礼”的慰劳司正活动则不需要另杀犬牲,从中可以看出乡饮酒礼与贵族私宴的区别。

综上所述,从乡饮酒礼行礼起点的确定,到酒会前半段强调等级强调礼敬的献酒程序,再到酒会中持续时间最久而且对酒会性质影响最大的无限量的自由饮酒程序,乡饮酒礼的进行无时不与享用犬牲保持关联。这种乡饮酒礼既是乡中贵族共饮的酒会,又是按身份地位分配折俎和宗族成员共享狗截的带有某种“狗肉宴”性质的聚食活动。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应当略作探讨。《仪礼》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经文都没有“其牲狗也”的记载,这句极其关键的话只见于前三篇的“记”。按传统的看法,“记”的可信性稍逊于经文。这是否意味着《乡饮酒礼》所记酒会本来并不特别强调使用犬牲,所谓“其牲狗也”只是后人的一种猜度呢?回答应是否定的。关于《仪礼》经与记的关系,沈文倬先生认为“附经之‘记’本来就是经文的组成部分,……经与附经之‘记’不是前后撰作的两种书,而是同时撰作的一书的两个部分”<sup>④</sup>。沈先生所说经、记同时撰作的结论还可以讨论,但记与经的写成时代不会相去太远却毋庸置疑。据

① 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49—754页。

② 《荀子·乐论》、《礼记·乡饮酒义》。《乡饮酒义》认为此语出自孔子,不可信。

③ 胡培塈撰,杨大培补撰:《仪礼正义》卷七,阮元编:《清经解续编》卷七〇四,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3册,第574页。

④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下)》,《文史》总第十六辑,1982年。

笔者分析,《仪礼》篇末“记”的编撰只比经文稍晚而早于《礼记》解释经义诸篇,其时代下限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经和记虽有早晚之分,但都是春秋末到战国中期以前这一较大时段内的作品<sup>①</sup>。从这种意义上说,沈先生的论断自有道理。《乡饮酒礼》诸篇经文未记用牲种类,可能是因为作者把乡礼使用犬牲视为普通平常、无须特别提示的事实。稍后的“记”文作者作出“其牲狗也”的补充说明,目的在于提醒后来读者注意这个关键的事实。如果不是对乡饮酒礼的用牲特点相当熟悉,不是对经文字背后的内容相当熟悉,不是有真实的礼俗背景为依据,“记”文作者绝不可能作出“其牲狗也”这种特殊的说明。

## 二、使用犬牲并非周代乡饮酒礼的通例

《仪礼》各篇大致写成于战国早、中期,书中关于乡、射、燕诸礼使用犬牲的描述是以当时真实存在的风俗为依据的。不过,《仪礼》的这种用牲规定却并不像古代学者理解的那样是周代通行的礼制。从其他史料反映的周代用牲惯例特别是周代贵族酒会的用牲情况来看,乡、射、燕诸礼使用犬牲很可能只是一种地区风俗。换言之,这种特殊的用牲习惯在周代的乡饮酒礼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食犬现象在周代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与唐代以后屠犬职业衰微的情形相对照<sup>②</sup>,犬在周秦时期确是“受到极大偏爱的常见食物”<sup>③</sup>。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需要注意的另一面事实是,由于家犬、猎犬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具有猪羊等家畜所不具备的特殊作用,它始终未曾成为肉类食物中的主要品种。通常所谓某一时代某一地区有食犬之风,只是强调此时此地的食犬现象相对而言比较突出而已。与食犬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相对应,古代礼仪生活中使用犬牲的情况虽因时代、地域、民族的不同而有差异,但总体说来人们对犬牲的重视程度要远低于牛、羊、猪等牲畜。周代的情况正是如此。

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的用牲等级已经相当明确和规范。按当时的用牲礼制,士级礼仪使用的牺牲是猪或犬,大夫使用羊或由羊、猪组成的“少牢”,国君以上贵族使用牛牲或由牛、羊、猪组成的“大牢”<sup>④</sup>。这种规定意味着犬、豕已被列为下等牺牲。《国语·楚语上》记载,屈到执政期间曾为楚国制订一系列包括“祭典”在内的“法刑”:

其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饔,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筵豆、脯醢则上下共之。不羞珍异,不陈庶侈。<sup>⑤</sup>

屈到担任楚国莫敖见于《左传·襄公十五年》,他“承楚国之政”制定祭典当在稍后,时间上大致与孔子诞生的年代相当。《国语·楚语上》记有楚庄王时大臣申叔时要求楚太子学习《春秋》、《诗》、《礼》等经典一事,说明春秋时期楚国的礼制和上层文化与中原各国大体一致;又据屈到之子、楚令尹子木(屈建)说,屈到的这套“法刑”不但受到楚人的拥护,而且广受其他各国的赞誉。因此,楚国“士有豚犬之奠”的祭典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当时各国通用的礼制。楚大夫观射夫对春秋贵族的用牲等级作过更详细的论述:

祀加于举。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上下有序,则民不慢。<sup>⑥</sup>

据韦昭注,这里的“举”是指“朔望之盛饌”。“举”和同段文字中的“食”都是指祭祀以外一般礼仪的用牲。“祀加于举”的意思是说,大型祭典的用牲规格要高于一般的礼仪活动。此外,《礼记·曲礼下》

① 胡新生:《论仪礼篇末“记”的编撰时代》,《文史》2007年第3辑。

②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七“唐时已不食狗”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③ [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嫔、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④ 商代卜辞中的“大牢”、“小牢”可能另有含义,周代的“大牢”、“少牢”则只能按传统的解释来理解。

⑤ 《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33页。

⑥ 《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64—565页。

所谓祭礼中“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同书《玉藻》所谓“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所谓“序五牲之先后贵贱：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以及《仪礼》本身关于大夫祭祖用少牢馈食礼，士祭祖用特牲馈食礼等等，都与《国语》记载的用牲等级基本相合。春秋时期等级化的用牲制度表明，在周人的观念里，犬牲作为祭品和礼仪供品的价值低于牛、羊、猪，并不是一种很被看重的牺牲。

先秦文献中有“六牲”、“五牲”、“三牲”等说法。按汉晋注家的解释，“六牲”的排列顺序是马、牛、羊、豕、犬、鸡<sup>①</sup>；马牲罕用，故有“五牲”之称，排列顺序依然是牛、羊、豕、犬、鸡<sup>②</sup>；“五牲”中去掉不太重要的犬和鸡就是“三牲”，又称“三牺”<sup>③</sup>。根据上面对周代用牲等级的分析，这些注家排列的“六牲”次序符合周人的基本观念。周人对牺牲“先后贵贱”的认识和对犬牲的较低评价，决定了他们不会把犬牲的位次排在牛、羊、豕之前，也决定了他们不会把“乡饮酒礼专用犬牲”视为一种通行的礼制。

犬牲之所以被列为礼仪用牲中较低规格的供品，除了它多被低级贵族使用的原因之外，又与它被经常使用于小规模礼仪有关。这两方面实际上是彼此关联的。低级贵族只有资格祭祀神祇体系中地位较低的神灵，所能主办的其他礼仪活动也不可能有太大的规模。高级贵族虽然有权使用包括犬牲在内的“六牲”或“五牲”，但从有关记载来看，他们通常是在举行一些小型的礼仪时才使用犬牲，而在重要的礼典中却很少使用或只是将它作为一种陪衬的供品来使用。

《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伯使卒出郕，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诗·小雅·何人斯》云：“出此三物，以诅尔。”毛《传》解释说：“三物，豕、犬、鸡也。”如毛说可信，那么用犬牲实施诅咒应是西周就有的传统。诅咒仪式的规模和重要性显然不能与那些庄严隆重的大型祭典相比拟。《周礼·秋官》有“犬人”一官，职责是“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凡几、珥、沈、辜，用骍可也”。文中的“凡祭祀，共犬牲”一语颇为笼统，没有涉及具体内容；随后提到的使用犬牲的仪式则都不很重要。例如，“伏”是指出行前举行的祭祀路神的“轅”祭仪式——将磔犬伏于道路令车轮碾过，这是一种规模很有限的仪式。“瘞”是指祭祀山林等地上神祇时将牲、玉等物埋在地下。据《周礼》所述惯例，“祭地瘞埋，用骍不用犬”<sup>④</sup>，瘞埋犬牲仍然多被用于不太重要的场合。“几珥”应作“刳衅”，是为器具、建筑等物涂抹血液的衅礼。《周礼·秋官·士师》特别提到“凡刳珥，则奉犬牲”，可见犬牲确被经常用于衅礼，而衅礼中除衅宗庙、衅社稷较为重要外，其他衅礼都是一般的礼仪。“沈”指沉牲于川泽。川泽有大小，犬牲能否作为主牲祭祀大江大河很成疑问。“辜”即《周礼·大宗伯》所说的“羴辜”，指劈裂牲体以“祭四方百物”。春秋时期秦德公有“磔狗（于）邑四门以御蛊灾”之举，郑众等学者认为汉代民间“磔狗祭以止风”的风俗还保留着周代“羴辜”的遗意<sup>⑤</sup>。磔狗之祭主要用于禳除灾祸，可以断定不是重大祭典。《山海经》“山经”部分多次提到以牲、玉祭祀山神，涉及犬牲的有《南山经·南次三经》“其祠皆一白狗祈（刳）”、《东山经·东山首经》“祠，毛用一犬祈”、《中山经·薄山之首》“祭尸水”“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鸡于下，刳一牝羊，献血”。这些用犬牲祭祀远方山川的仪式与《周礼·大宗伯》所谓“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祇）”不可同日而语，应当就是《周礼》常说的“小祭祀”。《逸周书·世俘》说，周武王克殷后“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用小牲羊、豕（豕

① 《周礼·膳夫》“膳用六牲”郑玄注。同书《牧人》注略同。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八“膳用六牲”条，据《周礼·食医》所述“六食”，认为马、牛、羊、豕、犬、鸡为祭用六牲，《膳夫》所述六牲应为膳用六牲即牛、羊、豕、犬、雁、鱼。

② 《左传·昭公十一年》杜预注。《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卢辩注同。东汉服虔注《左传》“五牲”列入四种野兽，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九“五牲三牺”条已予纠正。

③ 《国语·楚语下》有“三牲”，韦昭无注，清徐元诰《国语集解》引《太平御览·礼仪部四》孔晁说：“三牲，牛、羊、豕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提到“三牺”，杜预注为“祭天、地、宗庙”的三种牺牲，系误说。“三牺”即牛、羊、豕三牲，详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九“五牲三牺”条。

④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六十九“犬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册，第2867页。

⑤ 详《史记·封禅书》，《风俗通义·祀典》，《周礼·大宗伯》郑玄注引郑司农说，《尔雅·释天》郭璞注。

上当脱一‘犬’字)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在这里,犬被作为“小牲”用以祭祀神位较低的“百神水土”是十分明确的。

与犬牲多被用于小祭祀、小礼仪的情况相对应,在记述西周春秋历史的一等史料中,在一些重大祭典和类似的礼仪活动中,我们很少看到专用或主用犬牲的事例。如《尚书·召诰》说,周公、召公在新邑“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同书《洛诰》说:“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逸周书·世俘》说:“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sup>①</sup>,翼予冲子,断牛六,断羊二。”《诗经》多处涉及祭典用牲,但没有一处提到犬牲。如《周颂·我将》“我将我享,维羊维牛”,《豳》“於荐广牡,相予肆祀”,《丝衣》“自羊徂牛,鼎俎及熏”;《大雅·旱麓》“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小雅·楚茨》“济济跄跄,絜(洁)尔牛羊,以往烝尝”,《信南山》“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甫田》“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鲁颂·閟宫》“白牡骍刚,牺尊将将”,如此等等,均以牛羊为主牲。此外,《论语·雍也》有“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之喻,《老子》第二十章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之说,《左传·桓公六年》记有国君接见新生太子使用大牢的例子,都说明大礼使用牛羊或太牢是周代通行的惯例。

《周礼·大司寇》有“大祭祀奉犬牲”的说法,同书《槁人》提到“掌豢祭祀之犬牲”,《墨子·天志上》也说过“昔三代圣王”“莫不刍牛羊,豢犬彘,洁为案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这些记载与以上对犬牲地位的分析并不矛盾。《周礼》所谓司徒掌牛牲、宗伯掌鸡牲、司马掌羊牲、司寇掌犬牲、司空掌豕牲<sup>②</sup>,是从五行观念出发所作的一种设计,其精神实质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所说的按季节用牲的设计相同,并非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祭祀制度。《周礼·大司寇》所谓“大祭祀奉犬牲”、《小司寇》所谓“小祭祀奉犬牲”,都是按这种套路先验设定的礼制,其可信性要打很大折扣。退一步说,即便真正存在过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的制度,也只表明犬牲在大型祭祀中是配合大牢、少牢使用的牺牲(《墨子·天志上》所述即属此类),因为先秦时期很难看到单独使用或主要使用犬牲祭祀皇天上帝、社稷和始祖的事例。

总之,按周代通行的礼制,犬牲被确定为士级贵族的用牲,高级贵族也只在很不重要的场合使用犬牲,或者是在大祭祀大礼仪中把犬牲当作一种陪衬的小牲来使用。在这种总体背景下,《仪礼》所记乡、射、燕、大射诸礼专用犬牲的规定就显得特别奇怪。乡饮酒礼大多由乡大夫主持。郑玄《目录》认为乡饮酒礼是“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的礼仪<sup>③</sup>。孔颖达归纳说,乡饮酒礼适用于“三年宾贤能”、“乡大夫饮国中贤者”、“州长习射饮酒”、“党正蜡祭饮酒”等四种场合<sup>④</sup>。可见这是一乡范围内规模很大的酒会。《仪礼》记录的燕礼、大射则是级别更高的国君之礼。这种较高级别的宴会,不用公认高规格的羊或牛而专用犬这种“小牲”,与当时通行的用牲制度和用牲观念明显不合。如果说《乡饮酒礼》所记属于士礼,《燕礼》、《大射》的用犬之制也都是采用了士礼,那么这些礼仪何以强调专用犬牲而不用士级贵族更常用的豕牲?无论从哪方面看,酒会专用犬牲都只能说是一种奇特的规定,周代各国乡、射、燕诸礼不可能都采用这种礼制。东周时期齐国个别地区曾有“长女不嫁,为家守祠”的“巫儿”制,我们根据它与当时通行的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明显不合,就可以确认它是一种不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意义的地方性礼俗。与此同理,《仪礼》所述用犬之制的适用范围和影响范围应该也是很有限制的。

以上从礼制背景方面分析《乡饮酒礼》专用犬牲的规定与周代通行的祭祀用牲制度和用牲观念相悖,只是从可能性的角度说明周代的乡饮酒礼不会都是“狗肉宴”式的酒会。然而用犬是不是周代

① 此句“国”字应在“祀”前,详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41页。

② 《周礼》冬官部分已佚,据《周礼》体系理应如此安排,详《周礼·小宗伯》郑玄注引郑司农说;又详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三十六,第五册,第1440页。

③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八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980页。

④ 孔颖达:《礼记正义》卷六十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82页。

乡、燕通例的问题,仅靠分析祭祀用牲制度很难得出结论,因为这里还有另一种可能,即祭祀用牲与乡、燕用牲或许有所区别,周人祭祀不看重犬牲并不必定意味着他们对于乡、燕诸礼也持同样的观念。古代经师肯定乡、燕用犬礼制的普遍适用性,大都是从后面这种可能性上立论的。例如元代学者敖继公虽然承认“狗于牲为贱”,但仍将乡、燕用犬视为通用的礼制<sup>①</sup>。因此,问题的关键尚不在于可能如何而在于事实如何。先秦文献很少记载乡饮实例,仅有的几例又没有涉及用牲情况,不过一些间接的事实已足以说明问题。按《仪礼》所述,诸侯举行的燕礼和大射也专用犬牲,如果事实上有些性质和级别相近的酒会另用其他牺牲,那么《仪礼》“其牲狗也”的规定就很难说是一种通行的惯例或制度。下面试看金文、《诗经》、《周礼》记载的与《仪礼》之说相反的例子。

西周晚期的三年癸壶铭文云:“隹三年九月丁巳,王在奠(郑),乡(飨)醴,乎虢叔召,易(赐)羔俎;己丑,王在句陵,乡逆酒,乎师寿召兴,易彘俎。”<sup>②</sup>铭文提到的羔俎、彘俎应即周王飨礼中癸本人所用的“折俎”,礼仪结束后周王将此俎赏赐给癸,癸感到十分荣耀,特铸铜壶以为纪念。这次飨礼有没有犬俎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它也使用了羊牲和豕牲。飨礼其实就是高级的乡饮酒礼<sup>③</sup>。周王召集的酒会要比一般国君的飨礼、燕礼隆重复杂一些,但不会相差太远。对比癸壶所记事实,很难想象周代诸侯国君的燕礼都像《仪礼》记述的燕礼那样只用犬牲不用羊猪。西周早期的士上盃铭文(即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所称“臣辰盃”)云:“王令士上罍(暨)史矢殷于成周,豊(礼)百生(姓)豚。”<sup>④</sup>铭文中的“殷”是指大规模的殷祭。按周代礼俗,这种较大规模的祭祀往往伴有集体饮食活动,其性质与非宗教性的飨燕之礼也有相近之处。“礼百姓豚”实即为百姓设置彘俎,就此而言它可以与三年癸壶铭文相互印证。

《诗经·豳风·七月》最后一章说:“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无论此章描写的是公侯级的飨酒之礼还是规模较小的乡饮酒礼,其用羊而不用犬都与《仪礼》所记不合,足可证明使用犬牲不是周代乡、燕通例。汉唐学者也发现了其间的矛盾,但他们对问题作了一种很牵强的解释。毛《传》说:“飨者,乡人饮酒也。乡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sup>⑤</sup>孔颖达《正义》疏解道:“礼者,乡人饮酒以狗为牲,大夫与焉则加以羔羊,言‘曰杀羔羊’,是乡人见大夫而始发此言,故称‘曰’也。”<sup>⑥</sup>其实《乡饮酒礼》记录的就是乡大夫之礼,通篇都是说使用犬牲,其中已经明确提到来宾中若有“诸公、大夫”则如何,“公如(或)大夫入”则如何,却丝毫未见大夫参与即另杀羔羊的意思。何况《仪礼》认为国君举行的燕礼也专用犬牲,绝不可能要求乡饮时“大夫加以羔羊”。毛《传》为解决“曰杀羔羊”和《仪礼》用犬规定的矛盾,按自己的揣测给《仪礼》添加本来没有的东西,显然不足为训。郑玄《笺》因毛说难通,另出新解:“十月,民事男女俱毕,无饥寒之忧,国君间于政事而飨群臣。”如此解释仍与《燕礼》不合。孔颖达看到这一点,最后作出解释说:“《燕礼》‘记’云:‘其牲狗。’此大饮,大于燕礼,故用羊也。”孔氏何以知道《七月》所说酒会是级别高于燕礼的“大饮”?恐怕并无依据。其实只要不把《仪礼》使用犬牲的规定看作通礼,不迷信《仪礼》的规定在周代礼仪生活中具有样板性和经典意义,就根本无须对《诗经》“曰杀羔羊”作如此费力的解释。

《诗经·小雅·伐木》小序云:“燕朋友故旧也。”从内容看,全诗确是描写贵族酒会的场景。诗中“伐木许许,酾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诸父……于粢酒扫,陈馈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诸舅。”酒会中有羊有豕,也说明乡、燕使用犬牲并非通例。孔颖达于此解释道:

今《燕礼》者,是诸侯燕其群臣及宾客之礼。礼“记”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羜”

① 敖继公,《仪礼集说》卷六,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册,第222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09726,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册,第5115页。

③ 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4—767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09454.1,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册,第4971页。

⑤ 今本《毛诗正义》误脱“乡人饮酒也”数字,详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八之一、《说文》段注“飨”。

⑥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392页。



者,天子之礼异于诸侯也。宣十六年《左传》曰:“王飧有体荐,燕有折俎;公当飧,卿当燕,王室之礼”,是天子燕飧之礼异于诸侯,牲亦不同也。<sup>①</sup>

孔氏说《伐木》是写天子之礼,主要依据是诗中有“陈馈八簋”一语。毛《传》云:“天子八簋。”看来毛氏、郑玄没有像解说《七月》“曰杀羔羊”那样对《伐木》的用牲特点作更多的说明,是由于他们认为《伐木》反映天子之礼已经是无须加以证明的事实。孔颖达对此所作的补充说明是:

《周官》“掌客”职,五等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礼》上大夫六(笔者按:另有加饌二,应为八)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据待族人设食之礼。其《掌客》所云,谓飧饔饔之大礼;《公食大夫》,是诸侯食大夫之礼。

与认定《七月》所记飧礼是高于国君燕礼的“大饮”一样,这一解说也缺乏根据。按《仪礼》所述礼制,八簋可用于招待上大夫,从《伐木》诗中的“八簋”实难推出这是天子之礼。《伐木》是诗歌不是礼书,所谓“八簋”只是形容宴会上食物的丰盛,由此认定《伐木》所写是天子之礼或诸侯、大夫之礼都未免穿凿。不过,本诗末章说到“有酒酤我,无酒酤我”,表明宴会的级别不会太高。天子招人聚饮不会出现无酒而酤的情形,诗人吟咏的酒会不过是乡饮酒礼一类普通的聚饮活动而已。这种酒会用羊而不用犬,并不意味着它的规格比乡、燕诸礼高出一筹,只说明《仪礼》所记乡、燕诸礼的用牲习惯并不足以代表当时所有的同类礼仪。

《周礼·地官·牛人》说:“飧、食、宾、射,共其膳羞之牛。”在《周礼》作者看来,天子举行的飧礼、射礼是使用牛牲的。贾公彦《疏》云:“天子诸侯射,先行燕礼,皆有肴俎,故有牛也。”<sup>②</sup>贾氏没有解释为什么这里的燕礼用牛而《仪礼》中的燕礼用犬,只是强调天子之燕与一般的燕礼有所不同,“其牲犹得有牛”。孙诒让《周礼正义》说:“《燕礼》‘记’云:‘其牲狗也。’郑《目录》以彼为诸侯燕群臣之礼。此经天子射前之燕有牛,故贾谓天子礼异。……以《诗》及此经参证,天子燕牲其用大牢与?”<sup>③</sup>按孙氏的猜测向下推论,诸侯一级的燕礼至少应该使用少牢或特牛,怎么会突然下降到使用犬牲?周代各级贵族用牲的不同呈现为一定的等级次序。如果确实存在同一类礼仪天子用大牢、诸侯用犬牲这种无序的现象,等于说各国皆可按自己的喜好和习惯随便使用牺牲,那么《仪礼》所述乡、燕用犬的规定就更谈不上是广泛适用的礼制了。

古代礼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仪礼》中的礼仪是圣人所制或圣人所定。贾公彦《周礼注疏》开篇即说:

《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终始,分为二部,并是周公摄政大平之书。《周礼》为末,《仪礼》为本。

今文经学派更强调孔子在确定礼仪方面的贡献。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的《论孔子定礼乐》一节说:

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旁皇周浹而曲得其次序。大体固周公为之也,其愈久而增多,则非尽周公为之也。<sup>④</sup>

又有《论孔子定礼十七篇亦本周公之意》一节,认为《仪礼》十七篇的精神与《周礼》相贯通。这些观点很容易使人得出《仪礼》所记礼仪在周代具有经典意义或普遍意义的结论。宋人吕大临所谓“冠、昏、射、乡、燕、聘,天下之达礼也。《仪礼》所载谓之礼者,礼之经也;《礼记》所载谓之义者,训其经之义耳”<sup>⑤</sup>,就明显表现出这种倾向。其实《仪礼》不过是孔门弟子以个别地区流行的礼仪为蓝本加工改造而成的礼书,其中固然有不少的仪节、程序如饮酒礼的献、酢、酬之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也无庸否认作者下笔之际会有意识地融入某种指导思想并自认为是在为天下人立法,但是就实际影响而言,《仪

①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411页。

②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724页。

③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十三,第3册,第928页。

④ 邵懿辰:《礼经通论》,阮元编:《清经解续编》卷一二七七,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586—587页。

⑤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三〇引,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92页。

礼》记载的这些礼仪在周代并不具有经典或样板的意义。古代学者所想象的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各地都曾比照一种“旁皇周浹”的制度举行礼仪活动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春秋时期鲁国曾请周王室的礼仪专家来鲁国指导郊庙之礼<sup>①</sup>，晋国执政官士会甚至不知道有按等级使用体荐和折俎的礼制<sup>②</sup>，可见在此之前鲁国举行的郊礼和晋国举行的享宴之礼肯定不合王朝典制。晋、鲁两国卿大夫见面，前者“尚羔”而后者用雁<sup>③</sup>；西周春秋时期的鲁国都城內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葬俗<sup>④</sup>；《仪礼·士冠礼》后半段记有“若不醴则醢用酒”一节，郑玄认为“醢用酒”就是与醴法不同的地方性“旧俗”；《礼记·曲礼下》也有“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的说法。这些事例和论述，都反映出周代各国礼俗甚至是一国之内不同族群的礼俗颇有差异。另外，由特殊事件导致的地区性的礼仪变异更不鲜见，晋人的“墨衰经”<sup>⑤</sup>，邾娄人的以矢招魂，鲁国妇人的“醵而吊”<sup>⑥</sup>，都是其例。就大者而言，西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相对统一的礼制和文化（如礼器制度、文字和基本的价值观念等等），然而具体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礼制风俗又各具特色。在文化交流非常便利的现代社会，各种地区风俗尚能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何况是在山水阻隔、地域封闭性较强的周代。周代各国的礼仪实践不可能都按《仪礼》描写的那种模式来进行。特别是冠、昏、丧、祭、乡、射等等受王朝政治影响较小而受地区传统影响较大的社会性礼仪，其现实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尤其不是一部《仪礼》所能概括的。《仪礼》能部分地反映却不可能全面反映周代各地的礼仪生活，它和其他所有史料一样也有自身的种种局限。

朱熹曾说：“《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极细密，极周经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sup>⑦</sup>这段话比盲目夸大《仪礼》适用性的说法要圆熟得多，也比较接近《仪礼》成书的历史实际，但其中隐含的《仪礼》所记礼仪最细密最全面最合常道的意思仍不可取。按本文的分析，《仪礼》所谓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规定不但不够经典，而且是与周代通常所用的牲习惯背道而驰的另类风俗，是只被某一地区的人群认为“行得好”而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特例。

### 三、用犬规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渊源

根据《仪礼》的成书情况和周代食犬风俗的地域分布，可以推知书中所记使用犬牲的规定原是鲁国乡、燕、射礼特有的习惯。

《仪礼》的撰作与孔子、儒家和鲁国学术有着密切的关系。《礼记·杂记下》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这段话不但表明《仪礼》中的一些篇章在孔子晚年已经写成，也透漏出《仪礼》撰作的地域背景。《仪礼》其他各篇可能写定于稍后一段时间，其作者应当就是孺悲一类深受孔子思想和鲁国礼乐文化熏陶的孔门弟子。就像《春秋》原是鲁国国史而被儒家用作历史教本一样，儒家编纂《礼记》所依据的主要资料也是来自鲁国的礼制风俗。《尚书·顾命》的记述体例与《仪礼》颇为相近，说明西周史官早有记录礼典、仪法的传统。这类书籍在春秋时期被统称为《礼》，《国语·楚语上》所说太子必读的《礼》就是其中的一种。春秋各国都有这种《礼》书，号称尽传周礼的鲁国所保存的《礼》类文献理应更为丰富。孔子口述的《士丧礼》以及孔门弟子陆续撰作的《仪礼》各篇，极有可能就是根据鲁国史官保留的这些礼制资料修订加工而成的。“六艺”中的《易》、

① 《吕氏春秋·当染》，《诸子集成》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吕书第20页。

② 《左传·宣公十六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88—1889页。

③ 《左传·定公八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42页。

④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188—189页。

⑤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833、1976页。

⑥ 《礼记·檀弓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278页。

⑦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194页。

《书》、《诗》、《乐》主要出自王朝,各地传习的内容比较划一,与此不同,《仪礼》和《春秋》可以说是纯粹的鲁国典籍,其中除了记有各国共遵的礼制以外,肯定还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内容。对于这些内容,只有将其放在鲁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上来认识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如果说根据《仪礼》与鲁国礼制的联系推论乡、燕用犬风俗的地域范围还过于笼统,那么通过《乡饮酒礼》一篇与鲁国礼俗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这种风俗的地域印记。《论语·乡党》说:“乡人饮酒,杖者出,(孔子)斯出矣。”这是礼书以外的先秦文献明确提到乡饮酒礼的唯一实例。孔子经常参与乡饮酒礼,孔门弟子熟悉的也是这套礼仪,他们依据鲁国礼俗撰成《乡饮酒礼》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乡饮酒礼》记录的“旅酬”是酒会参与者按照尊卑次序递相酬酒的仪法——尊者先饮,然后向身份稍卑者敬酒;后者饮过,再向下一位身份稍卑者敬酒;如此依次相酬,直到身份最低的“沃洗者”也都接受敬酒为止。这种“甲饮讫送爵于乙,乙送于丙,丙送于丁,依次而遍”的饮酒礼仪很有特点,王国维曾将它与蒙古族的饮酒礼相提并论<sup>①</sup>。周代各地的乡饮酒礼是否都有“旅酬”之仪尚不明确,事实是现在所能看到的唯一的“旅酬”实例也是鲁国的,此即《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记季孙氏酒会中“及旅,而召公鉏,使与之齿”一事。礼书中谈到“旅酬”的文字如《礼记·曾子问》所谓“摄主不厌祭,不旅”,子思《中庸》所谓“旅酬下为上”等等,也都出自孔门弟子之口。由此可以大致推定,《乡饮酒礼》的撰作同最早写定的《士丧礼》一样,主要是参考了鲁国的礼俗。

从饮食文化背景方面来分析,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规定应是齐鲁居民嗜食犬肉的习惯在礼仪上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食用犬肉并非某地某族特有的风俗,但是把犬肉视为珍羞并当作宗族酒会中固定使用的酒肴,却只有在食犬之风特别流行的地区才有可能。综观先秦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以齐鲁为中心、北到燕国南到吴越一线是食犬之风最为兴盛的地区。《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有鲁国人杀狗而食的例子:“(晋)吏人之与叔孙(婣)居于箕者,请其吠狗,弗与。及将归,杀而与之食之。”《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记载,齐景公在晏婴的劝说下放弃了厚葬死狗的打算,“趣庖治狗,以会朝属”。《国语·越语上》说,越王句践的“十年生聚”政策中有“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之类的内容。这三例都发生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战国时期,孟子曾对梁惠王和齐宣王说过“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孟子·梁惠王上》),说明在酒上、齐、梁人的肉食结构中,狗和鸡豚一样是人们经常食用的品种之一。秦统一前夕,河内轹县人聂政“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自称“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羹以养亲”;“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史记·刺客列传》);汉初大将沛人樊哙早年也“以屠狗为事”(《史记·樊郤滕灌列传》)。战国以来燕、齐、丰、沛一带屠狗业的发达,正是春秋时期当地流行的食犬风俗不断发展的结果。

民间流行的食犬风尚只是乡饮酒礼专用犬牲的惯例得以形成的风俗基础和必要条件,但这种基础和条件并不必然派生贵族酒会专用犬牲的惯例。换句话说,虽然上述东方各国都有喜食犬肉的习惯,却不能由此推出这些地区的乡饮酒礼都用犬牲的结论。《仪礼》记录的乡饮酒礼是由一整套井然有序的法构成的礼仪活动,它的形成除了要有民间风俗的积淀之外,还需要有一批热衷于礼仪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文化人员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不断地加以整理和总结。后面这一条件只有鲁国具备<sup>②</sup>。作为鲁国儒家的作品,《仪礼·乡饮酒礼》关于使用犬牲的规定直接来自于当地的饮食习惯。前面详细列举鲁国以外东方地区的食犬风俗,只是想说明这条用牲规定其实也可以视为东方一带食犬习尚的反映。因为有这种相对宽广的饮食文化基础,《乡饮酒礼》“记”文的作者在补记“其牲狗也”一条时,才不会顾虑它有可能被外地学礼者看成一种不合情理的令人厌弃的规定。

鲁国乡、燕诸礼使用犬牲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出现的现象,它同其他地区风俗一样有着久

① 刘盼遂:《观堂学礼记》,载《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6页。

② 齐国饮酒礼可能较少限制,《史记·滑稽列传》所记淳于髡对饮酒活动的描述即是如此。

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在夏、商、周三个依次崛起的民族中,商族对犬牲最为重视。商代墓葬中以犬殉葬特别是在墓底腰坑内埋葬犬牲的现象颇为常见,可以说是商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墓穴以外使用犬牲的祭祀遗迹在晚商文化遗存中更为多见,如安阳殷墟宗庙基址附近、王陵区和家族墓地的祭祀坑中就有不少是专用犬牲的“狗祭坑”。殷墟宗庙宫殿区还发现有直接埋在夯土基址下或打破夯土基址的葬坑,“这些葬坑一般埋有人、犬,或羊、牛。……埋犬的坑通常每坑1犬,少数3犬或5犬,最多的埋20犬”。商代中期郑州商城东北发现过社祭遗迹:在6块大石周围分布着8个埋有狗骨架的祭祀坑,“仅就保存较好的狗头骨统计,8个坑内就有92个,一坑最多者23个,最少者6个”<sup>①</sup>。殷墟卜辞中说到使用犬牲的辞例很多,据日人岛邦男的综括有130多条,而这个统计还不完全。卜辞所见犬牲多被用于“寮”祭和“有”祭,祭祀对象涉及上帝、社神、先王、先公和先妣,一般用犬数量自一犬至十犬不等,较多者用百犬,最多者达三百犬<sup>②</sup>。比较典型的卜辞有“丁巳卜,侑寮于父丁百犬百豕卯百牛”、“甲午卜,侑于父丁百羊百卯十牛”等<sup>③</sup>。犬牲在商代祭祀中的地位虽不能与大牢、小牢或特牛相比,但是如此频繁、大量地使用犬牲却不能不说是商文化独有的特征。

殉犬和坑犬只能间接地反映商族人对犬的重视和喜爱,杀犬为牲则能直接反映该族群嗜食犬肉的习惯。古代祭礼中供奉给神灵的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最终要由祭祀者享用。周代祭祀祖先的祭肉和黍稷除了由“尸”即祖先代理者直接享用以外,另由专门选定的“饩者”吃完“神灵”的剩饭。祭礼结束后,祭礼主办者还要将部分祭肉分送给宗族、国家中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物。《周礼·大宗伯》所谓“以脰膾之礼亲兄弟之国”,就是指天子向同姓诸侯分赐祭肉。据《左传·僖公九年》所记周天子赐胙于齐桓公、《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说宋国“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膾焉”等事,“二王后及异姓有大功者,亦得脰膾之赐”<sup>④</sup>。《史记·孔子世家》说,鲁国也有国君郊祭后“致膾俎于大夫”的惯例。祭祀过程中族人分享祭肉,祭祀之后向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部落氏族分送祭肉,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古老传统。在这方面,商周两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上引殷人祭祖使用的百犬、百羊、百牛,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宗族盛会中供人享用的食品。一般说来,神灵的喜好不过是人类自身喜好的翻版,供奉给神灵的食物大多也是人类经常食用和特别喜爱的。商族人将犬牲作为鬼神喜爱的食物频繁地使用于祭礼,正折射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犬肉有特殊的嗜好。

商文化特别是晚商文化对周代齐鲁地区的礼制风俗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考古工作者将晚商文化概括为六个主要类型,其中三个类型分布于今山东地区或其附近:泰沂山脉北侧地区内的晚商文化被概称为苏埠屯类型,其遗址分布“大致西起鲁西北的阳谷、东阿一带,沿泰沂山脉北侧分布,东不过潍河,其北界约在今滨州市一带”;“以菏泽曹楼村安邱堍堆遗址命名的晚商文化安邱类型,其分布区主要是在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鲁西南和豫东一侧”;鲁南地区的前掌大类型“大体以曲阜、滕州一带为中心,西界不过今天运河、昭阳湖、微山湖一线,东界或可及临沂地区的西部,可能还包括江苏北部的部分遗址”<sup>⑤</sup>。其中的苏埠屯类型和前掌大类型,与文献反映的晚商时期山东地区的两个商文化中心蒲姑和商奄的影响范围大致相当。这两个方国就是商朝被推翻之后带领东方各族向周朝发动反扑的商朝旧势力的代表。周公东征以后,殷墟一带的商族分崩离析:有的随武庚和其他首领逃奔幽燕地区和朝鲜半岛,有的随微子受封宋国迁到商邱,有的被移徙于新邑成周,另外很多分支则附随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5、352页。

②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44页。该书所举用百犬以上的卜辞有:《甲骨文合集》第15521、16241、32674、32698号;《小屯南地甲骨》第204、503号。该书所举第32674号释文与原拓文句不尽相符,“侑燎于父丁犬百羊百卯百牛”应为“侑燎于父丁百犬百豕卯百牛”。

③ 《甲骨文合集》第32674、32698号,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2年。

④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三十四,第5册,第1365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13、315、316页。

鲁、卫等新封的姬姓诸侯到原商族势力较强的地区扮演以殷治殷的政治“工头”的角色。在这些商遗民比较集中的地区,鲁国是保留商文化因素较多的国家。西周大分封时,鲁公伯禽分得“殷民六族”。这些随伯禽迁入的殷商旧族以及奄邑原有的商族遗民构成了鲁国“国人”的主体,他们供奉着商族传统的社神“亳社”,顽强地传承着商族的风俗习惯。曲阜鲁国故城内的墓葬在葬俗方面有明显的差别,其中甲组墓时见腰坑和殉狗现象。与《左传·定公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的记载相对照,可知鲁故城内的甲组墓是以崇奉“亳社”的商遗民为主体的鲁国原住居民的墓葬<sup>①</sup>。孔子本人就是商遗民的后裔,孔子的祖先当年从宋国迁到曲阜也与这里分布着商遗民的聚居点有关。商族的饮酒之风原比他族为盛,商遗民的饮酒礼俗对鲁国饮酒礼仪势必产生较大的影响。以孔子常见的“乡人饮酒”礼俗为蓝本写成的《乡饮酒礼》,以及性质近似的《燕礼》、《乡射礼》、《大射仪》等篇,对犬牲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兴趣和热情,这与鲁国保留商文化因素较多,鲁国重视犬牲、喜食犬肉的人群比较密集等情况完全相符,其间的联系绝不会只是偶然的巧合。

追溯东周时期鲁国的食犬风俗和酒会用犬礼制的来源,还应当注意到历史更古老的少皞氏部族。也就是说,除了商文化的影响之外,泗上一带少皞族后裔的饮食传统对促成鲁国乡饮酒礼惯用犬牲的礼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周人习称曲阜为“少皞之虚”,这里本是嬴姓少皞族的故地。周公分封鲁国时要求伯禽统治和安抚的“商奄之民”,应即包括一部分嬴姓的少皞族后代在内。目前学术界对商文化的起源还有不同看法,但根据商族与少皞族都曾流行以鸟为始祖的图腾崇拜等事实,两个族群之间必有一定的地域联系和文化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少皞族和商族一样也有重视犬牲的风俗。

关于中国史前时代的犬牲使用情况,高广仁、邵望平先生曾有专文作过总结。文章指出:“史前时代饲养家犬或以犬为食,主要是黄河、长江两河流域。但以犬为牲、以犬随葬的情况却仅在有限的地区内发现。”文章列举了1986年以前相关的考古发现,包括江苏邳县刘林、江苏邳县大墩子、山东兖州王因、山东胶县三里河、渤海海峡砣矶岛、河南淅川下王岗、四川巫山大溪(今属重庆市)、江苏武进圩墩、上海松江广富林等九处遗迹。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以犬为牲的现象集中发现于大汶口—龙山文化之中,并散见于长江流域的几处遗址中……至于黄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史前文化中不见或罕见以犬为牲的现象”。文章认为:

在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中,以犬为牲的出现不迟于公元前4000年前,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晚期。属于东夷之域的徐州、滕县一带的商代遗址里也发现了犬牲。这样就为商代以犬为牲找到了可信的祖型。也可以说,商代以犬为牲这一新的文化因素不是来自先商的本土,而是吸收了东方海岱地区(也有可能来自长江流域)的文化因素发展而成。<sup>②</sup>

从时代和地域上看,考古学上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与先秦传说中的太皞—少皞族有对应关系,其中泰山南北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最有可能是少皞系部族创造的文化<sup>③</sup>。大汶口—龙山文化发现的用犬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少皞族对犬牲的重视和嗜食犬肉的习俗。如果说东周时代鲁国贵族酒会专用犬牲的制度在商文化之外还有更古的渊源,那么这个渊源无疑就是少皞族的文化。

另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是,拥有鸟图腾信仰、一般认为来源于东方少皞族的嬴姓秦国也对犬牲表现出特殊的偏爱<sup>④</sup>。《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编写的一部书,书中的“十二纪”在综合各地礼俗的基础上按五行观念设计了祭祀五帝的祭典:春季祭太皞,夏季祭炎帝,“中央”祭黄帝,秋季祭少皞,冬季祭颛顼。其中,春、夏、“中央”、冬季所祭诸帝都不是秦国宗教体系中原有的神祇,

① 张学海:《试论鲁城两周墓葬的类型、族属及其反映的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 高广仁:《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见氏著:《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00页。

③ 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④ 关于秦与少皞族或东夷集团的渊源关系,详见祝中熹:《早期秦史》,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

只有被安排在金行、西方、秋季的嬴姓始祖少皞才是秦国传统的祭祀对象,《史记·封禅书》所载秦襄公“自以主少皞之神”即可为证。按《吕氏春秋》“十二纪”的规定,天子每季度应当食用不同的肴饌,与秋季祭祀少皞相对应的礼制是“天子食麻与犬”。这种安排耐人寻味。“十二纪”的祭典设计大都有其理据可寻,从中可以窥见许多中原和东方地区已经遗失的文化传统。例如,这个祭典还为东夷族的祖先大皞和少皞安排了位置,而战国时代东方学者所设定的“五帝”系统却数典忘祖,把这两个曾对东方历史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神灵排除于大型祭典之外<sup>①</sup>;“十二纪”将大皞列在东方是依据远古的事实,将少皞列在西方则是着眼于当下的事实——“自以主少皞之神”的秦国当时正充当西方的霸主。《吕氏春秋》的编写宗旨是为即将统一的秦王朝规划蓝图,它对祭典的设计包括将食犬与祭祀少皞联系起来不是一种随意的安排<sup>②</sup>。联系上引秦德公“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等史实,笔者推测“天子食麻与犬”同祭祀少皞一样是秦人固有的传统,这种传统从侧面反映了少皞族喜用犬牲的风俗。虽然从现存文献中很难直接看到东周时期留居鲁国一带的少皞族后裔的饮食习俗,但是根据西迁秦族的重犬风尚可以推测后者同样保留着相似的饮食习惯。因此,在追溯鲁国乡饮酒礼用犬惯例的文化渊源时,不但要注意鲁国商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应把当地少皞氏遗族重视犬牲的因素考虑在内。

东周时期的鲁国和其他各国一样早已形成等级化的用牲礼制,也同样遵循以犬牲为“小牲”的通例。在这种背景下,乡饮酒礼以及类似酒会所保留的专用犬牲的习惯带有一种历史胎记的性质。周代贵族常用的从初民遮羞物演化而成的“蒂”饰,用蜃器盛放社肉分送亲友的“受脤归脤”礼节,饮酒礼仪中置而不饮的清水“玄酒”,士冠礼中第一次加冠使用的礼毕即可弃置的缁布冠,士昏礼中新人同匏而饮的合卺之礼……都是与生活常规有一定距离而被刻意保存下来的旧习。鲁国乡、燕用犬的情形与这些现象也有相似之处。

按郑玄的解释,乡饮酒礼专用犬牲的习惯还包含一层更深的寓意。《乡饮酒礼》“其牲狗也”郑玄注:“狗取择人。”<sup>③</sup>按郑氏之意,乡饮酒礼是“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的礼仪活动,它的主要功用是“择人”即选择贤者,这种“择人”的礼仪也要使用具有“择人”习性的牺牲。依照此说,人们在乡饮酒礼中专用犬牲不仅是延续了古老的习惯,而且有其特定的用意。“狗取择人”说有附会之嫌,明人郝敬即曾讥其为“迂”。不过,乡饮酒礼使用犬牲毕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规定,当时人自有可能对“何以乡礼必用犬牲”持有某种神秘观念或作某种特别的解释。关于乡礼用犬的“理由”,吕思勉先生曾作如下推测:

古男子多畜犬,女子多畜豕。乡饮酒之礼:“其牲狗。”《士昏礼》:“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饌。”

《越语》:“生丈夫者二壶酒,一犬;生女子者,二壶酒,一豚。”盖各因其所牧以为饌。”<sup>④</sup>

所谓上古“女子多畜豕”未必属实,而“古男子多畜犬”的说法则比较可信。《仪礼》记录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四种使用犬牲的集体聚会活动,都是只有男子参加的礼仪,其中从上古射礼比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4—208页。

② 《墨子·迎敌祠》、贾谊《新书·胎教》引《青史氏之记》皆以犬为南方火行之牲,其说当另有理由。又有以犬为木行者,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八“犬”条。

③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990页。关于乡饮酒礼用犬的解释,除(1)郑玄“狗取择人”说之外,另有:(2)元代敖继公认为“狗于牲为贱,而君之燕礼差轻,故用之,大射礼放此”。详见《仪礼集说》卷六,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第105册,第222页。(3)明代郝敬认为“《易·象》艮为狗,东北艮方,阳气所发生,饮以养生,故性用狗”。详见胡培肇:《仪礼正义》卷七引,《清经解续编》卷七〇四,第3册,第574页。(4)清代方苞认为“狗所以养老”。详见《仪礼析疑》卷五,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第109册,第74页。(5)清人夏忻认为“其牲狗者,是大夫之饌士用狗也”,“天子、诸侯饌用牛”,“诸侯与诸侯燕及天子燕诸侯”用牛羊。详见《学礼管释》卷四“释乡饮酒礼牲用狗”条,《清经解续编》卷九六九,第4册,第454页。以上(2)至(5)说或很牵强,或未讲出道理,反不如郑说可能保留了古义。清人吴廷华《仪礼章句》卷四说:“用狗义未详。”可见古代学者对用犬礼制的由来实无太好的解释。吴说见《清经解》卷二七四,第2册,第347页。

④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28页。

赛演变而来的两种射礼尤其崇尚男性的勇武。按古代“互渗”式的思维习惯,食用某物即可传染或接受此物的某方面属性。在男性贵族的酒会上不杀他牲专食犬肉的习惯是否也基于一种“互渗”的需要?鲁国旧族在嗜食犬肉的同时是否又赋予这种习惯以增强勇猛品质的巫术意义?不能说没有此种可能。据凌纯声所引资料,北美某些民族中确有类似的观念。如堪萨斯州的印地安人在出战之前,“在主将之家举行吃狗宴,因为狗奋不顾身卫护主人,吃了狗肉就可得其勇气”;达科他州有些部落的勇士“须吃狗肝,杀狗取肝,切成小条,悬在竿上,蹈舞时以口衔食,不准用手取”;加拿大太平洋岸某岛部落“信奉吃狗教,他们割或撕狗肉成块,吃若干块狗肉,对于所吃之狗,有宗教上的意义或热忱”<sup>①</sup>。对比这些资料,不妨对“自古男子多畜犬因而男性酒会用犬”的说法作进一步引申:乡饮、乡射、燕、大射等只准男性参加的聚会,最初都带有选拔勇士或表彰勇士的性质,这类礼仪活动中要求使用犬牲,一开始很可能有其特定的宗教—巫术方面的用意——通过食犬传递犬类的勇猛属性。惟其与这种深层的观念相关联,加之当地有重犬风尚,乡、射诸礼不用羊猪而专用犬牲才会作为一种不可更改的古老惯例延续下来。至于东周时代沿袭用犬旧制的人是不是还有这种意识,是不是仍然关心专用犬牲的来历,都不妨碍此种特殊礼制在其形成时期曾经包含神秘的意义。

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规定直到东汉时期仍为行礼者所遵行。司马彪《续汉书·礼仪上》说:“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sup>②</sup>《仪礼·乡饮酒礼·记》“乡朝服而谋宾介”郑玄注曰:“今郡国行乡饮酒之礼,玄冠而衣皮弁服,与礼异。”<sup>③</sup>郑氏注解“其牲狗也”没有提示“今”礼与古礼相异的问题,说明他看到的郡国乡饮酒礼亦用犬牲。汉代食犬之风较为普遍,这时的乡饮酒礼使用犬牲仍有比较深厚的生活基础。《晋书·礼志下》:“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诏曰:‘礼仪之废久矣,乃今复讲肄旧典。’赐太常绢百匹,丞、博士及学生牛酒。”<sup>④</sup>文中没有说明此次乡饮酒礼使用何种牺牲,从礼仪之后赏赐“牛酒”来看,即使其中仍用犬牲,也已经不是唯一或主要的牺牲。唐代是食犬风尚趋于衰微的时期,朝廷颁行的乡饮酒礼虽然也说到“设折俎”、“羞肉载醢”,但不再提使用犬牲。唐人所撰《晋书·礼志下》引用《续汉书·礼仪上》“郡、县道行乡饮酒”一段文字时将其中的“牲以犬”改成了“牲以太牢”,这种改动无意中透漏出唐人讳食犬肉的心理。此后的宋、明、清三朝官撰礼书都没有明确规定乡饮酒礼的用牲种类。这些事实表明,乡饮酒礼专用犬牲的规定自汉代以后已经成了只具文献意义的被废弃的古礼。

就总体性质而言,战国以后以“乡饮酒礼”名义举办的酒会包括汉代仍然使用犬牲的乡饮酒礼,实际上都是刻意仿古的假古董。周代的乡饮酒礼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礼仪活动,战国以后的乡饮酒礼却是在社会上已经不再流行此礼的情况下根据《仪礼》文本生造出来的礼仪表演;周代的乡饮酒礼多是乡中贵族自发之举,战国以后的乡饮酒礼却大都是奉旨而行;周代的乡饮酒礼除了政治意义之外还有增进血缘情感的社会意义和很强的社会控制功能,战国以后的乡饮酒礼却主要被当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士大夫标榜的通过此礼养老、尊贤、明孝悌等等其实大都流于空谈。总之,战国以后的乡饮酒礼因为丧失了古礼所具有的日常性、自发性和社会性,不但不能再现族人共食犬肉的原始风貌,而且整体上变成了一种缺少内在精神的很不自然的古礼仿制品。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① 凌纯声:《古代中国及太平洋区的犬祭》,《民族学研究集刊》1957年第3期。引自《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信仰民俗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②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册,第3108页。

③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第990页。

④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册,第670页。